

---

數位語藝認同化的「典例」研究：  
以分析擁、反核臉書粉絲專頁為例\*

曹開明、黃鈴媚\*\*

---

摘要

Burke 強調「典例」為「人們生活的裝備」，彰顯人們在語藝情境中願意接受符號行動召喚，進而形塑「認同化」；因而本研究採取「典例」研究方法，針對具代表性的擁、反核臉書文本加以分析。研究發現，無論是擁核、反核臉書的「活躍言者」，都運用「典例」爭取「我群」支持，但是忽視內部閱聽眾的認知「差異」，並以「事例」模糊涵括彼此的差異，不利與反對立場的「他者」對話，加深對同一語藝事件認同對峙情形，成為數位時代公共溝通的隱憂。本研究倡議，透過「典例」研究揭露網路「活躍言者」的言說動機，具有推展「數位識讀」的效用，促進「電子符號行動者」的認知觀念。

關鍵詞：典例、數位語藝、認同化、電子符號行動者

---

\* 本研究獲得科技部「臺灣能源政策溝通與建構核能共識：氣候變遷因應與核能安全之論述策略分析」（計畫編號：MOST103-2511-S-128-001-MY3）專題研究計畫之經費補助。

\*\*曹開明為國立國防大學新聞學系專任助理教授。聯絡方式：tommy.intw@msa.hinet.net  
黃鈴媚為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系專任教授，為本文通訊作者。聯絡方式：  
lmhuang@mail.shu.edu.tw

## 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近年來許多國內研究（方楓嵐，2015；邱旻翰，2015；林麗雲，2016；張致瑜，2014；黃鈴媚、沈錦惠、曹開明，2014；劉嘉薇，2016）發現，國光石化停建事件、洪仲丘事件、太陽花學運等引發社會變遷與運動的重大公共議題事件，都可以看到在網路特定場域積極發聲者的重要影響力。這些網路上的「活躍言者」<sup>1</sup>透過各種網路傳播管道，運用「符號行動」（symbolic action）形塑「我群感」以號召群眾行動，突顯無遠弗屆的「網路公民」（netizens）力量。例如「公民 1985 行動聯盟」臉書上的 39 位網路公民，率先在此社群媒體中要求洪仲丘案真相、國防制度改革及軍事審判法修法，經由網路集結與動員，進而引發二十五萬餘人挺身上街頭聲援，媒體讚譽為「臺版茉莉花革命」或是「白色康乃馨革命」！<sup>2</sup>

本研究認為，社群媒體不容小覷的傳播力量讓不同團體或勢力透過此種「自媒體」傳播管道，更積極、主動地形塑有助於促成自己所樂見的最終行動結果的真實，社群媒體上的活躍言者已經不再是一般所謂的網路「酸民」，因為他們的「符號行動」不再局限於一味嘲諷，而是透過多樣化的「符號行動」進行觀念倡導、認同凝聚或社群營造。是故，深入探討社群媒體活躍言者如何透過多樣化的符號行動，以便在論述交鋒中取得界定真實的論述權以及成功號召廣大群眾，有其必要性。誠如黃鈴媚等（2014）指出，公共議題網路輿情的醞釀發生是一種人際擴散歷程，必須由「我」而「我們」，然而，由「我」而「我們」的擴散歷程如何被啟動？具體而言，社群媒體活躍言者的符號行動如何在上述歷程扮演關鍵性角色？

---

<sup>1</sup>在網路特定場域積極發聲的團體或個人，例如在臉書貼文，並獲得閱聽眾按讚數多或回文量大的回應情形，具有意見領袖的意涵。

<sup>2</sup>公民 1985 行動聯盟，是 2013 年 7 月初洪仲丘案中受虐案發生後，由 39 位互不相識、各行各業的網友發起的民間組織，人員包括醫生、律師、軟體工程師、國會前助理、剛退役軍人、證券業上班族、老師、學生、家庭主婦等（10 位女性）。並於 2013 年 7 月 15 日在 PTT 號召發起公民 1985 行動聯盟。希望藉由訴求讓事件真相出爐，並且要求國軍改革，摒除以往的陋習及潛規則，「要真相！要人權！」。短短兩個星期，兩度上街頭，就成功號召數十萬人參與，打破臺灣過去國內社會運動組織動員模式，這場由鄉民網路串聯發起的新型態參與充分表現出公民的力量，而被媒體譽為台版「茉莉花革命」。（見《蘋果日報》電子報：<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30721/35165187/>）。

本研究認為，在探究上述議題上，語藝學者 Kenneth Burke「戲劇理論」(dramatism)中所提出的「認同化」(identification) (Burke, 1966: 378) 以及「典範事例」(representative anecdote) (Burke, 1962: 59-64) (後文一律簡稱為「典例」)，是非常具備啟發性的研究視角。由於「典範事例」在於強調統合多項「事例」後的簡約意義，世新大學口傳系已故副教授沈錦惠即建議本文，中譯為「典範事例」一詞更能夠傳達此一概念之意涵，若直譯為「代表性故事」，較傾向於呈現出「事例」的概念(沈錦惠，電子郵件，2015.04.03)。此外，Harter & Japp (2001: 412) 明確定義「典範事例」是一種「能獲得普遍認同的簡明語言方程式」！舉例來說，在台灣的社會文化脈絡下，諸多認同臺灣的故事形成「愛臺灣」此一「典範事例」，並獲得傳誦；相對地，如今「愛臺灣」也成為一個具有框架作用的語彙，甚至成為政治語言，用以召喚「我群」認同。

根據 Burke (1969) 的戲劇理論，西方語藝學已經從傳方(言者)本位的說服傳統轉向重視受方(溝通對象)的「認同化」學說。Burke (1963, 1989: 56) 主張，人類是「符號使用者」(symbol-using animal)，透過象徵符號(包括影音文字)的使用，產生各種「符號行動」。此外，符號行動的功能在促成「認同化」，亦即使用象徵符號「定義」人類世界，以促成合作，亦即形塑「我群感」的想像概念。Davis (2008:127) 也指出，「認同化」讓個體成為群體成員，所謂的「『我的』認同」(“my” identity) 即是在群體結構下的「認同化」產物。

此外，隨著「數位語藝」(digital rhetoric) 概念被提出來，網路傳播時代中高度歧異性公共議題的輿情成形歷程，成為語藝研究的新範疇(Eyman, 2015: 24)。針對「數位語藝」研究，Warnick (2007) 除了指出線上文本具有「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及「互動性」(interactivity) 特性外，同時直接援引 Burke 的認同化概念，強調網路論述特徵在於網路言者提出議題觀點後，引發其他網路言者參與互動與關切，交織形成符號行動，進而形塑社群認同。針對促成認同化的符號行動，Burke 在其「戲劇理論」中特別強調「典例」的作用。因為 Burke (1962: 59- 60; 1967: 293-304) 表示，「文學如同生活的裝備」(literature as equipment for living)，各種文學中都存在

著特定典例，具有導引溝通對象認知與詮釋真實的作用，俾利促成認同化。

然而，儘管語藝學者 Madsen (1993: 210) 認為，典例是 Burke 「戲劇理論」中，最應優先應用的語藝批評方法，但是他也指出，既有典例研究存在「先行冠名」(superimpose an anecdote onto the text) 的問題，意指研究者運用作者的解釋權力，先行指稱研究文本中具有特定「典例」，使得典例研究流於研究者主觀詮釋文本。此外，上述問題衍生出另外一個問題，那就是既有典例研究傾向假設文本存在單一典例，因而無法有效探討線上文本之「互文性」及「互動性」特性，導致網路社群凝聚認同的競合互動樣態。因此，本研究採取「文本導向」取徑來進行典例研究，探討網路上活躍言者在論述中如何形塑典例，是否藉由典例作為語藝策略主導其他閱聽眾的認知，以便在模糊化內部閱聽眾觀念間的「差異」時，同時深化「我群」與「他者」的差異性，以爭取閱聽眾對活躍言者的支持。

具體而言，本研究首先在理論上釐清數位語藝認同化與典例的關聯特徵。其次，再選擇具代表性的擁、反核臉書粉絲團為例，歸結其中活躍言者形成典例論述特徵，是否實然形成典例對峙僵化情形，以釐清社群媒體論述是否涉及活躍言者操弄的問題。<sup>3</sup>最後，本文建議數位語藝認同化實證研究，更應重視在數位語藝情境下，透過典例促成認同化的作用，不僅在於論述、傳誦的過程中，使得社群媒體參與者，共享言者意義而已，更應是提供傳受雙方共創意義的可能性，以倡導應具備「電子符號行動者」(electronic symbolic actors) 的「可交代性」(accountability) 的言說特質 (黃鈴媚、沈錦惠、曹開明，2014)，<sup>4</sup>俾益網路時代的公共溝通以及倡導

---

<sup>3</sup>由於 Burke (1969: 378) 曾指出言者在勸誘合作形塑「認同化」過程中，有意或無意間涉及意義制約、影響認知，可能形成「誤認」(misidentification)。此外，Hauser (2002: 214-215) 認為，當言者別有用心、有意欺騙或是形塑虛假的一致性 (create a false sense of unity) 時，言者就會運用語言符號，誘使受眾產生「錯誤認同感」(misidentify)。然而，數位語藝環境具備「互動性」與「互文性」特性，強調傳受雙方經由「合意」(consensus) 歷程以產生認同，因而本研究認為，與其說是「誤認」，不如說是網路「活躍言者」有意操弄，導致社群成員僅共享「活躍言者」強調的意義，這也成為數位語藝應加探究與審視的要項。

<sup>4</sup>「可交代性」(accountability) 一詞，臺灣學界多數翻譯為「問責」，例如王亞維 (2011) 在其〈電視媒體問責起源與發展：論國內外制度理論與實踐〉一文中指出，我國學術研究使用「問責」一詞的狀況也十分普遍，在華文地區的翻譯有「課責」、「究責」、「負責任」、「當責」等譯法，主要

「數位識讀」(digital literacy)，並提供後續數位語藝研究應用參考。

## 貳、數位語藝與「認同化」

當前網路環境下所形成的「自媒體」的溝通情境，具備區辨與分析他人言說動機的能力，才足以順遂進行溝通研究。Zappen (2005:323-324) 即曾指出：「數位語藝理論是將著重探討說服的傳統語藝研究，轉移到數位空間，藉以擴展語藝理論與批評方法的研究領域。」易言之，數位語藝不是單一的理論概念，而是摻合傳統語藝理論概念與其他社會學與文化研究等理論思維，進一步提升語藝科學與批評方法的效用，進而成為整合型的理論概念。Zappen (2005) 並指出，數位語藝研究主要聚焦在下列四個主要範疇：

1. 探究與分析數位文本中所使用的語藝策略。
2. 確認新媒體的語藝特徵、作用與限制。
3. 探究數位認同的形塑。
4. 探究建構語藝社群的效用。

根據 Zappen 上述建議，本研究認為，探究數位認同的形塑，是現階段數位語藝研究最需要關注的重點，因為此一研究焦點之研究成果將同時有益於其餘三個研究焦點之了解。

然而，誠如 Warnick (2007) 強調，網路上的言者涉及運用數位文本「互文性」特性，使得網路言者與閱聽眾間交互詮釋議題的文本，成為語藝策略的資源，因而在探討數位語藝的「認同化」議題時，無論在研究的理論架構或研究方法的選擇上，數位文本的「互文性」特性對研究者將帶來很大的挑戰。舉例而言，Pashaei (2010) 曾以美國「911 事件」後，網路部落格對於穆斯林的認知情形，指出是因為閱聽眾持續瀏覽相關網路文本並加回應意見後，進而引發對於穆斯林的關切，並歸結出活躍言者與閱聽眾彼此透過網路溝通，才形塑出對於事件事關重大的相互認知，所謂的「語

---

是針對公家單位或是官員需履行義務加以評斷。由於本研究援引此語用以探討「電子符號行動者」的「符號行動」時，並評估其最終行動效果，故譯為「可交代性」，明示其意。

藝情境」(rhetorical situation) 與「緊急狀態」(exigence)，其實是活躍言者與閱聽眾相互作用下的認知產物。

據此，Pashaei (2010) 進一步指出，既有「語藝情境」強調特定的「緊急狀態」才引發語藝論述的論點，須要加以修正，並強調網路論述主要是由特定社群媒體的言者、緊急狀態與網路言說公眾相互作用下形成特定論述。是故，Pashaei (2010) 歸結出這種強調網路言者與公共議題參與者共同形塑論述，具有「互動性」與「互文性」的論述特性，即是呈現出網路「語藝生態學」(rhetorical ecologies) 的意涵。也就是說，網路論述並非由活躍言者提出，由活躍言者提出語藝論述促成「認同化」作用，藉以召喚受眾共享意義；相對地，在「語藝生態學」的概念下，網路活躍言者的作用主要在於提供有用資訊，由網路「言說公眾」選擇接收後再加以共創意義。

具體而言，由 Edbauer (2009) 最早提出的「語藝生態學」概念，在於強調在網路環境中進行公共議題論述的形塑，已非單純地如同 Bitzer (1968) 提出「語藝情境」時所指出，是由於「情境」形成所謂的「緊急狀態」，言者提出因應解決的語藝論述，並要求閱聽眾關切與參與解決，也並非如同 Vatz (1972) 認為「語藝情境」是由於言者運用語藝策略才形成「緊急狀態」以召喚受眾注意。Edbauer 認為，在網路環境下，所謂的「語藝情境」是由於特定公共議題涉及公眾的感知經驗與情感，才會成為語藝事件，經由傳受雙方相互論述下，進而凝聚認同。

相對地，在 Burke 的認同化學說中強調：「語藝是勸誘合作的符號意義」(Burke, 1969: 23)，同時 Burke (1996: 378) 也已指出，人們感知外在的一切，無疑都會受到「符號支配」(symbol-ridden) 的社會結構所影響，因而在認同化過程中，容易導致意義制約、影響認知與行動。例如，Hess (2014) 進行網路實證研究即發現，網路言者形塑認同化時，主要仍囿於言者自身欲念與意見，無法提供受眾多元觀點，仍會形成言者操弄的問題。事實上，言者透過社群媒體平台進行溝通時，確實容易形成排除異己意見的情形，在論述上則有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傾向，藉以強化閱聽眾認知的作用。

然而，相對於 **Burke** 的認同化概念主張由言者主導論述，促使閱聽眾共享言者的意義；語藝生態學則是強調，言者的作用僅在於提供資訊以供闡釋，而是經由「言說公眾」(discursive public) 經驗與情感認知以共創意義，才形成特定論述及形塑認同。因此，「語藝生態學」與「認同化」理論概念間，出現一個明顯的觀點衝突，也就是在「語藝生態學」理論架構下，網路言說公眾具有共創論述意義的能力，因此不會有言者意圖誤導受眾或是操弄的問題。本研究認為，由於網路「語藝生態學」的理論建構，目前尚在初階發展時期，為能審視「言說公眾」共創意義的特徵，進而作為數位語藝的理論架構，目前首要解決的問題應是在於認同化形成的問題。

換言之，當網路活躍言者藉由符號行動促進認同化，其意圖便在創造「我群感」，相對地，也不能忽視與否認數位語藝情境也確實具有「互為文本」與「互為言者」的可能性。因此，為解決上述「語藝生態學」與「認同化」理論的矛盾問題，本研究主張，數位語藝研究應該區分兩個部分加以探究：首先，針對「活躍言者」的論述加以區辨，以理解言者為促使其意義為社群成員所共享，其所採取的語藝策略為何，其中是否涉及操弄的問題，這也正是本研究的研究目的。接著在上述研究成果基礎下，再針對傳受雙方在共享的意義前提下，是否能共創出新的意義，有效擺脫言者操弄的束縛。本研究認為，運用「典例」研究釐清網路文本特性，並加批評言者的操弄問題，進而提供後續探究網路社群媒體成員是否真能共創意義的依據，有利於數位語藝理論與方法的建構。

## 參、「認同化」與「典例」

### 一、「典例」是促進「認同化」的生活裝備

在 **Burke** (1962)《動機的文法》一書的「範圍與化約」(scope and reduction) 一章中，**Burke** (1962:59-64) 以專節方式討論「典例」的概念，將「典例」視為人們「生活的裝備」(equipment for living)，具有相互形塑認知以理解和應對外在環境變遷的功能。同時，**Burke** 也強調：「戲劇理論探討的是相關術語如何被展現與表達，主要涉及到『典例』如何被運用的情形，亦即是探討依循著語彙如何被建構及其所展現出來的形式」

(Burke, 1962: 59)。Cralle (2000a: 326-328) 更認為,「典例」概念是 Burke 「戲劇理論」的判準 (dramatism, justified by the representative anecdote), 是「戲劇理論」取徑用以查究人類動機的理论基礎與前提。

Burke (1962: 60) 也表示, 典例的意涵就是在彰顯戲劇理論為何採取「戲劇」的取徑, 而且是「一種戲劇理論的導論, 自戲劇理論演繹而來」(an introduction to dramatism that is deduced from dramatism)。易言之, 典例概念在於標明「戲劇理論」的核心要義。也由於典例是 Burke 戲劇理論的核心概念, 具備影響人們認知的特性, 因而 Steimel (2009: 60) 強調, 典例是人們面對類似的社會經驗時, 所產生的「積合效應」(summation)。也就是說, 典例是特定群體面對外在時空環境時, 會在經驗中尋求「事例」(anecdote) 加以詮釋, 進而積累成為眾所認同的共知共識, 於是這些特定事例經過不斷傳誦, 整合成為具有引導認知和行為作用的典例。因此, 在理論層次上, 典例是語藝論述中持續展現出來的主題與故事, 在社會文化脈絡中, 足以引發人們共鳴的特性, 因而是能獲得認同的簡明語言方程式 (Harter & Japp, 2001: 412)。

Day (1960) 則認為 Burke 的認同化概念, 在於彰顯語言促進人們在社會中相互認同的關鍵作用。Day 並強調 (1960: 273), 認同化是言者說服聽者的唯一途徑, 藉由語言策略傳達訊息「符號」(signs) 給聽者, 在訊息符號中必然要提供能夠聯結雙方認同的「資產」(properties)。由此可知, 認同化概念會經由典例形塑而成。易言之, Burke 「戲劇理論」在於倡議符號行動是協調人類社會行動的核心, 藉以促成認同化的達成, 而要促成「語藝的互動」, 言者必須提供足以聯結傳受雙方認知需求的「資產」, 這即是典例促成認同化達成說服的作用。因此, 根據 Burke 的「戲劇理論」, 欲探究促成認同化的語藝行動, 自然應該注意其中是否存在典例的情形, 因為為了促進認同化的達成, 無疑涉及運用符號資產, 形成創意詮釋尋求他人認同連結, 而這即是典例的作用。

然而, Burke (1962:59) 指出, 人們尋求語彙期能忠實地反映 (reflect) 真實, 但必然會發展語彙以選擇真實。但在特定情境下選擇何謂真實的作



用，也必然涉及到扭曲真實。同時，Burke（1996: 45）在《語言如符號行動》一書中，專章討論「終極視域」（*terministic screens*）時也指出，任何術語即使都是在反映真實，必然同時都具有選擇真實的特性，而且也都擴展為具有折射真實的功能。即如 Burke 所言，這是因為人們使用符號的特性，使得語彙會「折射真實」（*deflection of reality*），影響人們認知。因此，Burke（1962: 59）強調，為了探究人類的動機，重點在於討論人們使用語言以及其中涉及形塑偏見的情形。

例如 Steimel（2009）曾以「新聞中的難民：新聞報導中難民認同化／差異的典例」為題，採取文化批評的取徑，探討美國主流媒體對美國境內申請難民的回教徒涉及歧視，即因其採用特定「事例」（回教徒行徑凶狠、曾爆發過勞工衝突事件）作為論述主軸，導致民眾排斥回教徒難民，進而歸結出主流媒體操弄種族論述的問題，助長特定偏見與歧視的情形。這也顯見可透過典例研究探討論述文本促進認同化的作用，並可釐清其中是否存在言者有意操弄的現象。也因此，本研究認為，當「戲劇理論」在探究被賦予何種特定意義的語彙或術語，以促成認同化，除了探討其中是否存在典例外，也應該從批判角度探討典例如何選擇真實或導致扭曲真實。

## 二、「典例」研究作為語藝批評方法

研究者在進行典例研究時，宜避免其他語藝批評方法（譬如戲劇五因分析）偏向「研究者導向」的缺陷，甚至導致簡化文本以及機械套招的問題。相對地，透過「文本導向」的研究方法，則可分析語藝事件（*rhetorical event*）發展過程中，不同的事例如何整合成為主導論述的單一典例。尤其在進行數位語藝的認同化研究時，若面臨大量文本時，可善加運用典例研究及步驟，俾能關注網路「活躍言者」如何選擇真實或導致扭曲真實。

現有研究者根據 Burke 所提出的典例概念，已然引申成為語藝批評方法，藉以評估論述的效用與價值（Brummett, 1984b, 1985；Edwards & Valenzano, 2007；Harter & Japp, 2001；McCane, 2010；Scodari, 1987）。其中，Brummett（1984a）在「柏克的『典例』作為媒體批評方法」一文中即引申 Burke 的「文學」（*literature*）概念可用「論述」（*discourse*）取代，並

且涵括大眾媒體所呈現的文本內容。Brummett (1984a: 161- 164) 並解釋典例概念可作為語藝批評方法的原由，在於社會中所潛藏的問題必然涉及到論述以及如何解決、應對難題的論述策略。Madsen (1993:214-215) 甚至強調，典例研究是 Burke 戲劇理論中，最應優先加以應用的批評方法。

由於典例研究著重確認在不同的文本中，存在引發共鳴的事例，人們依據事例作為認知的依據，統合、形塑出典例概念。即如 McCane (2010: 399) 指出，在不同的文本中，可能存在著引發共鳴的「普遍事例」(common anecdote)，並成為一套「大語藝策略」(grand rhetorical strategy)。也就是說，探討典例就是針對特定論述文本內容，釐清其中是否已然整合形成一套特定的語藝策略，進而提供批判言說動機的工具，藉以理解人們如何選擇語彙導引社會真實。因為透過典例批評研究，有益於釐清語藝論述中所具備特定敘事特徵與方式，進而彰顯言說動機。

例如，Brummett (1985) 以「電影是生活的裝備：鬼屋影片」為題，並以典例概念作為文本分析方法，歸結在美國在 20 世紀數部經典鬼屋影片均展現出人們對於社會失序與混亂感到焦慮的事例。推論出鬼屋電影彰顯出人們的恐懼，因此具有涵化效果，影響人們對於社會真實的認知並且支持維持社會穩定的政治行動。由此典例研究方法可知，研究者是透過文本分析，首先要找到的是如何論述事例，並且尋得在社會歷史特定脈絡下，所展現出來的論述主體，及其所引發、形成的論述策略，並且具備說服人們認知及指導行事作為的效用，成為人們在社會中必要的「生活的裝備」。

然而，即如前述已提及，Madsen (1993: 210-211) 認為，典例研究涉及「先行冠名」的問題，容易導致研究者陷入主觀詮釋文本的問題。Madsen 並批評 Brummett (1985) 將典例作為一種分析方法時，因為採取「先行冠名」的作法，藉以建構其文本分析，視典例為透鏡或濾鏡的作用，忽視了文本內容存在其他可能的事例特徵。Madsen 並進一步批評 Brummett 的典例研究仍是研究者自己將想當然爾的典例投射在文本研究上，卻無法確認是否真正展現文本中的事例，缺乏外在社會脈絡依據的支持論證，導致無法對文本所呈現的複雜性加以解釋。

Madsen (1993) 認為，為了能夠合理地尋得文本中的典例，可採取三個步驟：首先，應歸納文本中的「戲劇組合」(dramatic alignment)，也就是文本中使用的關鍵語彙組合與互斥情形 (what goes with and against what)，再經由統計表列方式加以確知文本中存在特定的論述主題；其次，需尋得文本中的「想像的群集」，藉以確認何者為典例，尤其是典例可謂是「標題中的標題」(title of titles)，具備展現符號行動特質的作用；第三，區辨「符號行動」的組成要素，藉以確認典例。

本研究審視後續相關典例研究，發現主要仍是以例舉方式說明文本中存在的關鍵語彙與特定論述主題，進而歸結「發現」(discover) 文本中的典例。例如 Darr (2009) 先提出美國總統歐巴馬在競選與就職演說文本中，存在著「傳統」(tradition)、「個人責任」(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與「相互責任」(mutual responsibility) 等關鍵語彙，進而歸結出「關鍵時刻」(defining moments) 的「典例」，強調美國所面臨的嚴峻考驗，主要涉及傳統與變革間及個人主義與社會責任間的衝突，強調唯有突破這種二分法的政治死結，才有可能超越意識形態的糾結迎向完美。McCane (2010) 則探究「伊斯蘭國」組織如何論述美國境內黑人濫用古柯鹼的問題，他並在文本分析中發現，「伊斯蘭國」透過宣稱毒品是白人進行種族屠殺的陰謀故事，並且例舉出其中存在著運用「黑色同盟」(dark alliance) 等關鍵語彙，並歸結出「種族滅絕」(genocide) 的「典例」概念，作為其召喚黑人認同的語藝策略。此外，Edwards & Valenzano (2007) 探討美國前總統柯林頓時代的「後冷戰時期外交政策」，則是自行由相關論述中例舉出「維持美國世界領導地位」(continuing U.S. world leadership)、「明確定義威脅與共同利益 (threats and interests must be defined broadly) 以及「在後冷戰世界中倡議民主」(democracy promotion was the mission for the post-Cold War world)，並歸結出其中存在「新伙伴關係」(new partnership) 的「典例」，期能改善東西方的外交戰略對峙情形。

綜上所述的典例研究文獻，主要仍是選擇少量代表性文本，再以例舉方法說明其中存在關鍵語彙以及特定論述主題，並加歸結出典例。然而，本研究認為，儘管上述研究步驟符合由文本發現典例的原則，但是若欲研

究大量網路文本，除了參酌 Madsen (1993) 提出的研究步驟外，宜嚐試人工統計編碼方式，表列網路文本中使用的關鍵語彙組合以及論述主題群集，更有助於研究者歸結其中特定事例，以便進一步論證、確認其中存在典例的實質特性。這也正是本研究在後續分析時，嚐試進行的分析步驟。

為確認事例與典例的關聯作用，Williams (1986: 6-7) 曾歸結 Burke 《動機的文法》一書觀點後指出，一個典例之所以能夠形成，必需融合「本質事例」(constitutive anecdote) 以及「告誡—激勵事例」(admonitory-hortatory anecdote) 的特質，並依語藝事件加以運用。簡言之，「本質事例」意指足以呈現出言者動機的事例，針對「告誡—激勵事例」，其中「告誡事例」是標示出語藝情境的潛在威脅，而「激勵事例」則是促使人們向前邁進。此外，Williams (1986: 7) 也強調，「典例」不是一種語藝的「形式」(form)，必需融合「本質事例」與「告誡—忠告事例」後，真正達到「實質共享」的認同化作用。本研究認為，透過分析本質、告誡與激勵事例的特徵，有益於典例研究的操作分析，進一步區辨符號行動的意涵與性質。

現階段若欲進行數位語藝的認同化研究，確實需要有一套相對應的研究架構，以深入探討是否所有的語藝事件最終都會出現足以引導眾人認知和行為作用的單一典例？還是更普遍的情況是形成爭相運用利於己見的典例，導致典例對峙與僵持現象？本研究認為，回答上述問題，需要透過可以還原相關事例由「我」（一方主張）而「我們」（多方傳誦）的網路社群擴散歷程的研究模式。然而，既有的「典例」研究，主要都是針對文本存在單一典例，欠缺對網路社群討論公共議題時相互對峙典例的可能性討論，導致過度簡化單一典例浮現歷程中，各方爭相運用各種事例以期召喚最多人當下的認同的策略性互動。尤其是各方藉由事例召喚認同時，相對也使得區分與差異又再產生，這也是當前臺灣在數位環境下公共溝通所面臨實際難題，實應加以探究。換言之，對於關心網路輿情的成形歷程者而言，應留意對於典例浮現歷程進行系統性分析，以便更加理解數位環境下，網路社群凝聚認同的競合互動樣態。

因此，下階段進行社群媒體的典例研究，本研究即依據 Madsen (1993)

的研究步驟，先以人工編碼方式加以表列論述主題，再結合 Williams(1986) 強調事例融合成典例的原則，作為區辨「符號行動」組成要素的方法。在「文本導向」的原則下，確認數位語藝認同化的形塑特質。進一步來說，依據典例研究方法進行語藝批評，也可理解網路中的活躍言者，如何運用典例據以創造出「思維引導術語」，勸誘閱聽眾認同，甚至加以傳誦與共創意義。

#### 肆、「典例」研究例證：擁、反核臉書粉絲專頁

為例證說明數位語藝「認同化」與「典例」間的關連性，本研究嘗試結合 Madsen (1993) 建議的典例研究步驟與 Williams (1986) 強調三種類事例融合成典例原則，首先選取核能議題文本，進行人工審視文本中經常出現的重要關鍵字群集，再加編碼表列出特定的論述主題（例如本研究在選定的反核文本中，三位編碼員發現「愛護」、「環境」、「自然」、「臺灣」、「孩子」、「子孫」等詞彙，經常在文本段落中共同出現，故討論歸結出反核主題為是愛自然、愛環境、愛台灣）；其次，為能區辨「符號行動」的組成要素，將這些代表社群成員「共同想像的語言群集」的主題，加以類歸為本質事例、激勵事例及告誡事例，俾能確認這些事例的特質，進而歸結出「典例」。

具體而言，本研究以 Facebook 上有關核能議題的粉絲專頁為觀察場域，<sup>5</sup>並在 Facebook 搜尋欄位中，以「核能」、「核電」、「核四」、「反核」、「廢核」、「擁核」等關鍵字搜尋核能相關的討論群組、社團、粉絲專頁。接著以「核能發電的立場」、「成立的時間」、「最近一次更新日期」和「按讚人數」為篩選條件，選擇具有代表性的群組樣本。最終選取「核為真相」、「核能流言終結者」、「媽媽監督核電聯盟」和「全國廢核行動平台」等四個討論群組，並選擇以 2014 年 4 月 28 日「政府宣佈核四封存記者會」此一關鍵事件前一個月為資料蒐集時間（2014 年 3 月 28 日至 4 月 28 日），在選定的四個臉書群組中共擷取了 902 則的貼文（如：表一）。

<sup>5</sup>本研究結合科技部研究案，已先行觀察「媽媽監督核電聯盟」、「全國廢核行動平台」、「核為真相」、「核能流言終結者」臉書貼文內容，發現相關語藝論述無法融合成單一「典例」，其分殊且僵持的論述情形，確實值得更進一步加以探究。

表一：擁、反核臉書研究樣本

核電立場	項次	臉書群組	成立時間	按讚人數	期程內貼文數	網址
擁核	1	核為真相	2013.03	37272	47	<a href="https://www.facebook.com/truthofnuclear/">https://www.facebook.com/truthofnuclear/</a>
	2	核能流言終結者	2013.03	19862	257	<a href="https://www.facebook.com/NuclearMythbusters/">https://www.facebook.com/NuclearMythbusters/</a>
反核	3	媽媽監督核電廠聯盟	2012.12	57499	227	<a href="https://www.facebook.com/momlovestaiwan">https://www.facebook.com/momlovestaiwan</a>
	4	全國廢核行動平台	2013.01	98203	371	<a href="https://www.facebook.com/stopnukesnow/">https://www.facebook.com/stopnukesnow/</a>
合計					902	

(註：資料收集時間為 2015 年 7 月 28 日)

本研究經初步審視文本後，為歸納論述主題，首先由三位編碼員（包括本文第一作者）初步審視 902 則貼文，各自標示所有論及核能、核四、能源、台電等關鍵字的段落。在進行命題類目計算工作之前，本研究先隨機抽取 100 篇文章，計算編碼員相互同意度及編碼員間的信度本研究平均相互同意度為 0.874，本研究之編碼員間信度為 0.95，已達到良好的信度標準。<sup>6</sup>

其次，三位編碼員以相互討論與比較的方式，綜整出在四個臉書粉絲頁中，出現的擁、反核命題，最終歸納出 22 個「擁核」與 21 個「反核」主要命題類目表（如：表二）。

<sup>6</sup>其計算方式如下：相互同意度 =  $2M / (N1 + N2)$ 、編碼員間信度 =  $[n * (\text{平均相互同意度})] / \{1 + [(n - 1) * \text{平均相互同意度}]\}$ ，其中  $M$  = 完全編碼相同的數目、 $N1$  = 第一位編碼員應有的同意數目、 $N2$  = 第二位編碼員應有的同意數目、 $n$  = 參與編碼工作的人數。依據上述公式計算檢測結果如下：編碼員一與編碼員二之相互同意度 = 0.864、編碼員一與編碼員三之相互同意度 = 0.883、編碼員二與編碼員三之相互同意度 = 0.876。

表二：擁、反核臉書「活躍言者」論述主要命題

題號	擁核主題	題號	反核主題
1.	日本重啟核電	1.	天災難料，人類無法控制
2.	核電最具經濟效益	2.	核能發展成本／後果全民承擔
3.	節能減碳，核電不可或缺	3.	臺灣難以承受核災／輻射危害
4.	廢核後能源供電不足	4.	日本福島核災殷鑑不遠
5.	再生能源成本過高	5.	核四施工品質令人質疑
6.	再生能源汙染問題	6.	擁核是政治操作
7.	反核只有口號，缺乏配套措施	7.	政府不顧民意強硬蓋核電廠
8.	核電為穩定基載電源	8.	再生能源取代核電
9.	核電廠本身具有多套安全防範設備，發生意外主因是人為因素	9.	節能取代核能
10.	反核先力行節能再談反核	10.	傳統發電效能升級
11.	傳統發電高成本、汙染與危險	11.	核電不符經濟效益
12.	恐核症作遂	12.	臺灣核電廠位處高風險地帶
13.	核電是支持經濟基礎	13.	廢核不影響電力供應
14.	臺灣不具零核條件	14.	核廢料無處放置
15.	廢核電價高漲	15.	政府掩蓋核電真相
16.	反核是不理性的／政治的抗爭	16.	人民（公投）決定核四／核電未來
17.	興建核四廠有其必要性	17.	最好的核安就是廢核
18.	核廢料處理有解決方案	18.	反核廢核是世界趨勢
19.	臺灣必需能源自主	19.	林義雄是臺灣的良知
20.	核電是世界潮流	20.	反核是愛人類、為孩子
21.	廢核／再生能源的代價是由全民／弱勢承擔	21.	反核是愛自然、愛環境、愛臺灣
22.	臺日核電廠地理環境不同，發生大型海嘯可能性低		

本研究再經由第一作者與第二作者依據表二所示擁核、反核臉書「活躍言者」論述主題進行討論，歸納形成呈現「活躍言者」擁、反核最主要原由的個別主題，並加標明為「本質事例」。本研究經討論、歸類後，認為

擁核主題中主要強調的「本質事例」為「發展核電，確保能源自主」（擁核主題 2、4、13、19），這與臺灣政策思維長年以來標榜「拼經濟」相符合，因為「拼經濟」無疑是為了「愛臺灣」！因此擁核的論述主軸，強調台電提供穩定的電力能源，就是「拼經濟」的重要基礎建設。

相對地，反核命題中主要強調「福島核災殷鑑不遠，臺灣無法受核災衝擊」，運用的「本質事例」（反核主題 1、3、4、12、19），主要是以 2012 年日本發生「311 震災」導致福島核電廠輻射災害，以召喚反核認知，尤其福島核災事作的相關新聞報導，確實是臺灣民眾的集體記憶，再結合歷年來反核運動提出「非核家園」口號，反核論述運用的「本質事例」主題，在於訴求臺灣地小人稠，並處於地震帶，進而強調臺灣是全然不具發展核電條件的地方。

更值得注意的是，擁核主題所呈現出的「激勵事例」（擁核主題 1、20）為「擁核是世界潮流」；相對地，反核命題所呈現出的「激勵事例」（反核主題 18，提及德國廢核作為事例）則是「反核是世界潮流」；擁核者以日本在福島核災後重啟核電廠加以說明、反核者則舉出德國全面廢核為例，加諸擁、反核論述均以再生能源作為「告誡事例」（擁核主題 5、6 對照反核主題 8），分別舉證貶抑反與讚揚鼓勵，也是形成矛盾對峙情形。也就是說，網路公領域的擁、反核對話間，各自提出了「本質事例」（能源自主 V.S.非核家園）、「激勵事例」（日本重啟核電廠 V.S.德國全面廢核廠）以及「告誡事例」（再生能源污染及成本問題 V.S.再生能源充足可取代核電）（如：表三）。

上述分析結果中，本研究得出以下初步結論。首先，擁、反核的「活躍言者」在各自的臉書貼文中舉證「事例」時，涉及有意（或無意）一味標榜對己方有利的說詞，避談不利的部分。事實上，本研究分析擁、反核立場臉書粉絲頁時，也發現即使出現少數相左立場的貼文與回文，卻被有意、無意地忽略，凸顯「活躍言者」與支持的閱聽眾擁、反核立場論述相當明確。從活躍言者與支持的閱聽眾的對話（即分析回文部分），確實可見文本中存在「典例」（擁核拼經濟 V.S.反核守護家園）僵持對峙現象。本研



究認為，擁、反核社群各自堅持的典例，其作用在於形成擁、反核認同區隔情形，反而不利於凝聚公眾共識。

表三：擁、反核臉書事例與典例特徵

	分析擁核臉書	分析反核臉書
本質事例	能源自主	非核家園
激勵事例	日本重啟核電廠	德國全面廢核廠
告誡事例	再生能源污染及成本問題	再生能源充足可取代核電
典例	擁核拚經濟	反核守護家園

其次，在反核立場的臉書中，即使出現「內部閱聽眾」的觀念「差異」論述也未被強調，例如採取我反「核四」但不反核能的立場者的回文，所提及反核四但不反核能的主張，仍被上述反核命題中強調「福島核災殷鑑不遠，臺灣無法受核災衝擊」所涵括，亦即運用福島核災的事例強調核四安全性堪憂，模糊不反對核能的主張。相對地，擁核立場臉書中也出現「內部閱聽眾」的觀念「差異」（例如採取電力若是充足，核四停建也無妨的立場者），但是也被核電最具經濟效益或是核電為穩定基載電源等擁核命題所模糊涵蓋，凸顯核電在臺灣缺乏資源的情境下，是無可取代的經濟民生選擇。也就是說，擁、反核立場的「活躍言者」在社群媒體中善用有利己方立場的事例論題，達到引發最大化共鳴的作用。活躍言者運用事例的功用，不在於解決差異，而在於模糊支持者間的觀念差異。

此外，在擁核臉書論述出現的「拚經濟」的典例，是活躍言者在訴求擁核社群時優先運用的語藝策略；相對地，反核臉書論述出現的「守護家園」的典例，則彰顯出以環保為訴求的語藝策略。「拚經濟」與「守護家園」兩者間存在「典例」的對峙與僵持，代表臺灣在重商主義與環保思維下的兩端拉扯。在各有立場的活躍言者的言說動機驅策下，擁核與反核臉書文本的典例論述，呈現的是極端對峙的符號行動：擁核「拚經濟」的典例作用，在於歸罪於反核支持者無視臺灣經濟局勢嚴峻，一味地追求非核家園；相對地，「反核守護家園」的典例，則是聚合相關事例的符號行動，藉以歸

罪擁核支持者不愛臺灣這塊土地。擁核與反核臉書的活躍言者運用典例的認知作用，各自歸罪「他者」以合法化己方的符號行動，無疑是在威脅社群成員應順從己方意見。

本研究認為，經由上述實證確知，在網路社群媒體中的活躍言者與閱聽眾相互作用下，即使「內部閱聽眾」觀念有所「差異」，由其論述命題所歸結的事例，可發現事例具有模糊化觀念差異的符號行動作用。在此所謂的認同化情形，意指人們因著尋求與他人同質的認同天性，接受活躍言者運用事例的召喚，甚至導致閱聽眾必須選擇認同一方，產生對單一語藝事件的認同分裂情形。也就是說，典例的作用，原應是人們「生活的裝備」以形塑認知，但以本研究擁、反核臉書呈現的典例對峙的特徵，在社群媒體形塑「我群感」之際，反而加深公共議題溝通僵局的形成。因此，透過本研究可知，網路活躍言者確實具有相當的論述主導性，因而本研究強調，在數位語藝時代中，倡議培養具備「可交代性」的「電子符號行動者」，有其意義與必要性，同時也符應「語藝生態學」強調言者提供資訊以供「言說公眾」創造意義的論點。

### 伍、數位識讀：倡導「電子符號行動者」

雲端科技公司和沛科技負責人翟本喬應總統府之邀，講授網路溝通的要領，在其臉書轉述課程重點時指出，網路溝通講求「內容要真、態度要誠、表達要美」（翟本喬，2015.01）。本研究認為，這位被網民尊稱為「翟神」的翟本喬所強調的網路溝通重點，確實有益於解決本研究上述實證所發現的問題：擁、反核的網路活躍言者經由典例作用，有意操弄閱聽眾，導致社群成員僅共享活躍言者強調的意義。本研究認為，網路上的活躍言者的符號行動必須具備「可交代性」，才具備「電子符號行動者」的特質，<sup>7</sup>因為語藝學強調符號運用必涉及美感美學，而社會行動必涉社會價值規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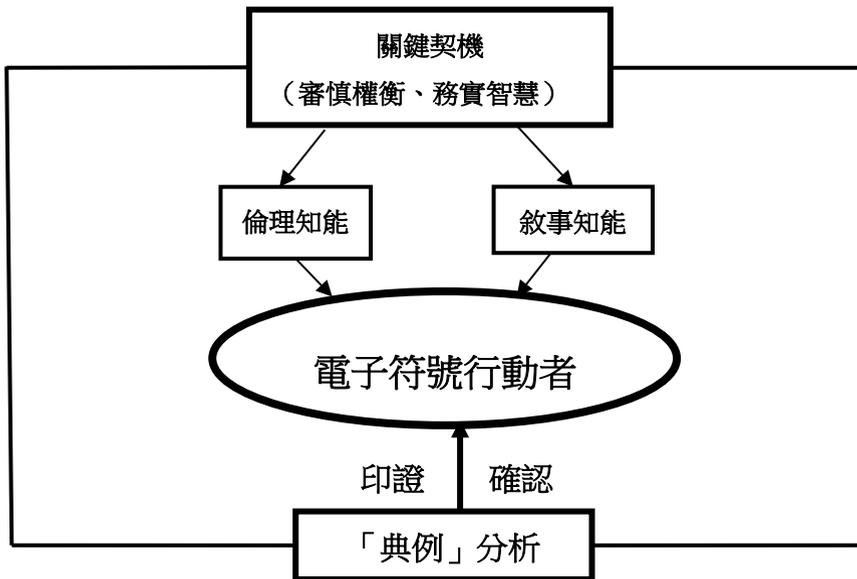
---

<sup>7</sup>依據黃鈴媚、沈錦惠、曹開明（2014）對「電子符號行動者」的界定，意指在網路環境下，電子符號行動者具有論辯實踐的能力，並依循著「人文理性的語藝精神」的「可交代性」（accountability）的準據下，應具備「倫理責任」與「美學素養」的內涵，藉以檢視其符號行動的最終效果。而檢視關鍵在於著重「可交代性」的「倫理責任」評估，透過審視論述中如何定位「我與關係、我群與他群關係」，確認電子符號行動者是否已在公共議題上真正承擔起社會責任，並作為公共傳

(social decency)，所以符號行動必須展現溝通者的美學與倫理責任雙重素養（黃鈴媚等，2014）。以上所述，與翟本喬所強調的「內容要真、態度要誠、表達要美」，相互呼應。

具體而言，進行數位語藝認同化研究時，必須清楚 Burke (1966) 之所以提出「符號行動」，用意在於突顯「言者」的語藝是包含意圖目的、充滿策略思考的道德行動，亦即不單主體性鮮明，更具備倫理承擔意義（見沈錦惠，2009：176-180；Burke, 1963）。簡言之，所有具備目的和意圖動機的「符號行動」，都必須面對行動效果評估，任何網路媒介使用者的溝通行動都有其社會影響和社會責任，有其理該受到檢視與評估。本研究認為，典例研究不但可作為理解數位語藝認同化論述中符號行動的方法，同時也可以突顯符號行動之倫理責任的重要性。換言之，透過典例研究的語藝批評方法，有助於呈現言者動機，並進一步分析是否存在網路活躍言者有意操弄他人之情形。

然而，本研究認為，在探討是否存在網路活躍言者有意操弄的問題時，必須清楚認識活躍言者所面對的挑戰。換言之，面對維繫特定價值規範或社群命運時，網路活躍言者不只是客觀地或機械性地進行翟本喬所謂的「完整、沒有隱瞞」的溝通行動，因為當活躍言者思考其「可交代性」時，很難避免以下挑戰：對「我群」負責或對「他者」負責？沈錦惠(2009：276-283)便指出，社會正義問題需放在社群價值和願景下，進行評估，所謂的倫理知識因而須因時地民情而制宜。因此，「典例」研究的重點在於對網路活躍言者的網路實踐有所認知：亦即「電子符號行動者」如何在符號互動當下關照「敘事知能」與「倫理知能」（如：圖一）。



圖一：流動情境中之「典例」研究實踐模式

對社群媒體活躍言者而言，無論是「倫理知能」或「敘事知能」，最大的挑戰都是在採取符號行動的當下此刻，擁有「審慎權衡」(prudence)的務實智慧 (phronêsis) (Vico, 1790/1990)，以掌握「關鍵契機」或「時機」(kairos)。也就是說，無論是「倫理知能」或「敘事知能」，必須是以「電子符號行動者」能夠掌握「關鍵契機」為前提要件。由於社群媒體的「自媒體」特質，公眾意義共享更繫於「活躍言者」的「敘事知能」，否則僅是在召喚「我群」進行對話溝通，甚至忽視內部閱聽眾的認知「差異」，反而是以「事例」加以模糊涵括。也就是說，「事例」的論述關鍵在於符號行動者的行動美學素養，而美學素養是針對溝通對象的習性，拿捏「創新／沿襲」之間的恰當比例，並表現在論述的表達形式 (黃鈴媚等，2014)；因而如何選擇事例進行論述以及所傳達的典例意涵，均是應加留意關切的部分。

換言之，由於 Burke 強調典例是「人們生活的裝備」，彰顯人們在語藝情境中願意接受符號行動召喚，進而形塑認同化，因而活躍言者與閱聽眾透過積累事例成為典例，形塑彼此相互合意的敘事認同。

因此，典例得以成功形塑，是如同 Bitzer (1968: 10) 在其「語藝情境」一文所指的切合情勢的「適切回應」(fitting response) 結果，有效且成功地回應語藝事件，並爭取到認同。更如同沈錦惠 (2011: 276) 歸結「關鍵契機」的意義，在於「在特殊情境中，以符號行動促成正義與和諧。」因而典例的作用，應該是網路活躍言者審時度勢下，在語藝事件當下提出可促成正義與和諧的符號行動。

然而，本研究透過典例研究方法卻發現，具有代表性的擁、反核臉書粉絲頁中，活躍言者各擁己見，與閱聽眾間「互為言者」與「互文性」的作用，僅在於呈現出「一言堂」式的論述現象。也就是說，人們因著尋求與他人同質的認同天性，接受言者運用事例的召喚，卻因言者的動機不同，針對同一語藝事件各自採取引用的「事例」無法融合成單一典例，甚至出現「典例」僵持對峙情形。此一情形可能導致閱聽眾必須選擇認同一方，產生對單一語藝事件的認同區隔現象。因此，透過「文本導向」的典例研究來探究數位語藝認同化情形，有助於釐清網路社群媒體公共議題溝通僵局的形成歷程，以及探討與揭露促成僵局的相關因素，對於推動「數位識讀」將有所貢獻。

誠如 Reid (2012) 針對 Burke 強調的符號行動，提出「思辨數位語藝」(speculative digital rhetoric) 概念，指出學者應該留意各類符號行動，其中恐存在言者運用其權力傳播「虛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 或是「幻象」(illusions)。也就是說，針對社群媒體形塑認同化過程，確應透過持續的社群媒體的實證研究，標示出網路活躍言者與「言說公眾」們，究竟僅是在共享言者所導引出來的真實，遂行著言者操弄與傳遞「虛假意識」與「幻象」，亦或是實然存在傳受雙方共創意義的可能性。

由於數位語藝理論目前仍處於初期發展階段，本研究僅論證活躍言者形塑出典例對峙，造成對公共議題認同區隔的問題。後續研究可再加針對社群媒體的「言說公眾」是否僅共享言者意義，亦或是已然共創新的意義，再加以討論。即如 Burke (1937: 230) 曾指出，符號使用歷程中，確有出現「意義展延」(casuistic stretching) 的可能契機及可能性。亦即彰顯受

方對於言者的論述已再加詮釋意義，並置入新的隱喻、意涵或是原則，同時也可驗證其他網路平台也使用這些共創新義的特定語彙，則可用以論證網路言說公眾已然擺脫言者操弄的問題。此外，也可再加選擇具有代表性的網路社群文本，審視言者所採取的事例類型，進一步掌握同一語藝事件中典例形塑歷程中，若具有上述的共創意義的特徵，則可區辨事例融合成典例情形，印證「電子符號行動者」有效掌握「關鍵契機」的語藝論述特質，俾能增益「語藝生態學」理論之後續發展。

## 參考文獻

- 王亞維 (2011)。〈電視媒體問責起源與發展：論國內外制度理論與實踐〉，「2011 年中華傳播學會年會」論文。台灣：新竹。
- 方楓嵐 (2015)。《「公民 1985 聯盟」網路論述的語藝視野：以洪仲丘事件為例》。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邱旻翰 (2015)。《PTT 社群網站網民意見之探勘：以太陽花學運為例》。世新大學資訊管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沈錦惠 (2009)。《電子語藝與公共溝通》。台北：天空數位圖書公司。
- 沈錦惠 (2011)。〈時機與傳播情境：評介《語藝與時機：歷史、理論、實踐論文集》〉，《傳播研究與實踐》，1 (2)：269-283。
- 林麗雲 (2016)。〈太陽花運動中臺大新聞所學生在「E 論壇」的實踐〉，《傳播研究與實踐》，6 (1)：251-269。
- 黃鈴媚、沈錦惠、曹開明 (2014)。〈網路傳播社會中的「電子符號行動者」：從台灣國光石化案重構閱聽人之主體性〉。《傳播與社會學刊》，(27)，101-148。
- 張致瑜 (2014)。《應用文字雲技術分析四大平面媒體與社群網站關注議題之差異：以洪仲丘事件為例》。銘傳大學傳播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論文。
- 翟本喬 (2015.01.03)。〈給總統上課〉。上網日期：2015 年 10 月 25 日，取自 <https://zh-cn.facebook.com/notes/ben-jai/%E7%B5%A6%E7%B8%BD%E7%B5%B1%E4%B8%8A%E8%AA%B2/10153139214764113?fref=fb>
- 劉嘉薇 (2016)。《學生臉書使用與政治參與：以太陽花學運為例》。台北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碩士在職專班論文。
- 蘋果日報 (2013.07.21)。〈39 網友發起臺版茉莉花革命〉，《蘋果日報電子報》。上網日期：2013 年 10 月 28 日，取自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30721/35165187>
- Bitzer, L. F. (1968). Rhetorical situation. *Philosophy & Rhetoric*, 1(1), 1-14.
- Brummett, B. (1984a). Burke's representative anecdote as a method in media criticism.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1, 161-176.

- Brummett, B. (1984b). The representative anecdote as a Burkean method, applied to evangelical rhetoric. *The Southern Speech Communication Journal*, 50, 1-23.
- Brummett, B. (1985). Electric literature as equipment for living: Haunted house films.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2, 1-23.
- Burke, K. (1937). *Attitudes towards history* (3<sup>rd</sup> ed.).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urke, K. (1962). *A grammar of motives*. Berkeley: California Press.
- Burke, K. (1963). The human actor: Definition of man. In J. R. Gusfield (Ed.) , *On symbols and society* (pp. 56-74).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Originally in *The Hudson Review*, 16(4), 491-514.)
- Burke, K. (1967). *The philosophy of literary form*. Berkeley, CA: California Press.
- Burke, K. (1969). *A rhetoric of motives*. Berkeley: California Press.
- Burke, K. (1973). *The philosophy of literary form: Studies in symbolic action*. Berkeley: California Press.
- Burke, K. (1996). *Language as symbolic action*. Berkeley, CA: California Press.
- Crable, B. (2000a). Burke's perspective on perspectives: Grounding dramatism in the representative anecdote.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86, 318-333.
- Crable, B. (2000b). Defending dramatism as ontological and literal.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48, 323-342.
- Darr, C.(2009.06). *Burke's representative anecdote and Barack Obama: Transcending dialectical tensions through the crucible of 'Defining Moment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Washington.
- Darr, C., & Strine, H. (2008.07). *A pentadic analysis of celebrity testimony in congressional hearings: Giving voice to the voiceles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 Davis, D. (2008). Identification: Burke and Freud on who you are. *Rhetoric Society Quarterly*, 38(2), 123-147.
- Day, D. G. (1960). Persuasion and the concept of identific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46(3), 270-273.
- Edbauer, J. (2009). Unframing Models of public distribution: From rhetorical situation to rhetorical ecologies. *Rhetorical Society Quarterly*, 35(4), 155-71.
- Edwards, J., & Valenzano, J. (2007). Bill Clinton's "new partnership" anecdote: Toward a post-Cold War foreign policy rhetoric.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Politics*, 6(3), 303-325.
- Eyman, G. (2015). *Digital rhetoric: Theory, method, practic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Harter, M. L., & Japp, M. P. (2001). Technology as the representative anecdote in popular discourses of health and medicine. *Health Communication*, 13(4), 409-425.
- Hauser, A. G. (2002). *Introduction to rhetorical theory* (2<sup>nd</sup> ed.). Prospect Height: Waveland.
- Hess, A. (2014). You are what you compute and what is computed for you: Considerations of digital rhetorical identifica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Rhetoric*, 4 (1), 1-18.
- Madsen, A. (1993). Burke's representative anecdote as a critical method. In J. Chesebro (Eds.), *Extensions of the Burkean system* (pp.208-229). Tuscaloos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 McCane, J. B. (2010). Genocide as representative anecdote: Crack cocaine, the CIA, and the Nation of Islam in Gary Webb's "Dark Alliance". *Wester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74(4), 396-416.
- Pashaei, F. H. (2010). *Unstable situations: A rhetorical approach to studying blogs about muslims*.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Virginia.
- Reid, A. (2012). Digital humanities now 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a speculative

- digital rhetoric. In J. Ridolfo & W. Hart-Davidson (Eds.), *Rhetoric and the digital humanit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codari, C. (1987). Contemporary film and the representative anecdote of unmasking: Coping strategies for a narcissistic society. *Central States Speech Journal*, 38, 111-21.
- Steimel, S. (2009). Refugee in the news: A representative anecdote of identification/ division in refugee media coverage. *The Kentucky of Communication*, 28(1), 55-75.
- Vatz, R. E. (1972). The myth of the rhetorical situation. *Philosophy and Rhetoric*, 6(3), 154-161.
- Vico, Giambattista. (1790/1990 ). *On the study methods of our time* (Elio Gianturco. Ithaca, trans.).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Warnick, B. (2007). *Rhetoric online: Persuasion and politics on the world wide web*. NY: Peter Lang.
- Williams, D. (1986.10). “Drams” and “Nuclear War” as representative anecdotes of Burke’s theories of ontology and epistemolog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Chicago.
- Zappen, J. P. (2005). Digital rhetoric: Toward an integrated theory. *Technical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14(3), 319-325.

## **Study on the “Representative Anecdotes” of Digital Rhetorical Identification : Take the Analysis of Pro-nuclear and Anti-nuclear Facebook Fan Pages as an Example**

**Tsao, Kai-Ming & Huang, Lin-Mei**

---

### **Abstract**

Kenneth Burke emphasizes on the role of “representative anecdotes” as equipment for living, through which people express their willingness to accept and to be called upon by a symbolic mode of action in a rhetorical situation, and their identification is shaped and formulated in the process. This study uses the “representative anecdote” approach to conduct an analysis of the representative pro-nuclear and anti-nuclear Facebook fan pages. The active speakers on the social media platforms aim to obtain the “we-group” support through the use of representative anecdotes and overlook the presence of cognitive discrepancy amongst the internal audience. The speakers use anecdotes to vaguely include the differences, leading to potential “misidentification” amongst the audience and impeding the dialogue with others who hold an opposite position in this matter. The situation often degenerates into an impasse of people who identify to different sides of a rhetorical incident and stymies the communication of a public issue. For this reason, this study proposes that a study of representative anecdotes can reveal the motives behind active social media users’ speeches and better understand the role of electronic symbolic actors, thus promoting digital media literacy.

Keywords: representative anecdotes, digital rhetoric, identification, electronic symbolic actors

